

制度创新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Promot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推动文化发展繁荣

章建刚◎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制度创新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Promot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推动文化发展繁荣

章建刚◎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创新 推动文化发展繁荣 / 章建刚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482-1594-3

I. ①制… II. ①章… III. ①文化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8257号

责任编辑: 柴 伟
装帧设计: 刘 雨

制度创新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Promot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推动文化发展繁荣

章建刚
◎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8.25

字 数: 600千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1594-3

定 价: 80.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0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序

20 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随着社会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文化消费需求也日渐旺盛，但文化体制和文化生产依然停留在旧的计划体制框架内，无力向人们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越来越丰富多样的文化需求。国际上，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然蔚为大观，美国包括视听产品和电脑软件在内的文化产品出口甚至超过了航空航天工业，成为第一大宗出口产品。而我国加入 WTO 后，相应要对外开放部分文化市场，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我国形成很大压力。不仅如此，文化在整个人类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面对人口增长、城市化、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日益凸显的不平等和持续贫困，世界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发展途径，更能体现发展的意义和人类的进步，真正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这就需要充分考虑文化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一种创新源泉的巨大而持续的作用。这种认识成为世界发展的新的共识。内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发展终于在此时正式催生了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而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潮流一经开启，它就蓬勃向前。至今，文化体制改革仍继续深化，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正朝着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目标迈进，普通民众有了更多的文化参与、文化表达、文化生产的权利和渠道。这是一个有深刻意义的变革。一批目光敏锐的学者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视野聚焦于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

作者是我国最早介入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学者之一。2002 年 2 月，作者参与主编的国内第一本文化蓝皮书《2001—2002 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报告》公开出版。这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标志性作品。其后每年一本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尤其是其中作者直接参与撰写的总报告已经成为行业内最具权威和指导性的文本。当然作者的研究工作显然

不止这一项，作者的研究领域也不止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作者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保护与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文化经济等领域都有深入独到的研究。特别要指出的是，作者的研究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与实践保持着密切关联，源于实践，指向实践，力图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例如，作为专家，作者受聘为文化部牵头的国际文化多样性公约部际协调机制专家，参与了国际文化多样性公约相关的一些文化外交工作；同样作为部聘专家，作者也参与了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开展的全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的工作。近十多年来，作者汲汲于全国各级政府、企业、乡村、高校，或调研，或讲课，或作咨询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作者针对实践活动的具体对象，撰写了大量论文，从学术层面进行梳理，从理念层面进行设计，从战略层面进行谋划，从路径层面进行探寻。作者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在业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综观这些文章，无不与我国从宏观决策到微观操作的文化体制与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十多年来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在我国是新的概念与新的实践，它们在旧有的学科体系中没有明确的地位和归属。此一领域的研究者大多来自不同的学科，其中主要是文学、艺术学、美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等。作者原是研究美学的，而作者的美学研究有很深厚的哲学基础，尤其精于符号哲学，这种学科背景使作者对文化及相关的研究有独特的视野和希冀。文化是属人的，文化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或者说，人得到提升并能生活在一种审美的（和谐的）意义境界中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最终目的。如果说，过去的美学研究或审美研究与社会现实缺乏结合，从而缺少在现实中通往审美理想的路径，那么今天在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和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中可以发现美学的现实性可能，从而寻找到审美理想实现的途径。作者从美学掉头进入经济学表达的大致正是这样的意思。“美学应该‘掉头’，不再仅仅瞭望虚无缥缈的未来，而是埋头脚下，回到现实，用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手段来改造社会，在推动特定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实现审美理想。”（见本书“导语”）

作者主张文化发展可以并必须通过市场方式来实现，这显然不同于习见之

论，是很值得再一次深入地考量的。我国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天然有不信任市场的传统，尤其在现实文化、体制、制度诸方面与市场不接轨的情况下，市场缺乏约束机制，或被权力所腐蚀，市场化表现出的负面作用为人们所深切感受。文化需要保护，不能让其遭受市场侵害的观点便为大多数人所赞同。因此这样的考量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市场究竟是什么，它应该有些什么内在要求？一是市场对文化的作用是什么，它通过何种途径对文化发生作用？或许这就是作者“搭建”文化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作者所提出的制度创新，推动文化发展繁荣，也就是要创新出符合市场所要求的制度设计，用市场之力来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当然作者也清楚地看到，市场并非万能，在市场不到之处应该有公共文化服务，不过作者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是辅助性的。“文化发展总是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实现的。我们首先关注经济体制。这里说的经济体制有两个：一是文化市场，二是公共文化服务。前者是基础性的；后者是辅助性的。”（见本书“导语”）当我们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还对市场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市场推动力缺乏足够重视的情况下，作者的这一态度鲜明的观点值得我们充分关注。

我与作者有相同的经历。同样下过乡，同样沐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进入同一所大学。大学期间我们就经常探讨文学、美学、哲学问题。大学毕业后虽然分处两地，相隔数千里，但交流不断。尤其近十多年来共同致力于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研究，更有密切的交往与合作。与作者的交往是最令我获益也是最令我愉快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自己的研究常常是受作者的启发而形成的。现在作者嘱我为他的这部论著作序，我想，这也就像敲锣打鼓开个场的意思，精彩的演出在后面开始。这是一部丰富而厚重的论著，相信读者一定能从作者缜密的思想 and 严整的文风中受益，并对作者所论及的事项和问题有新的认识。

是所望焉！

施惟达

2013年6月于云南大学

导语：文化发展研究与文化经济学视野的搭建

本书所收录的 50 多篇文稿是我在 2000 年前后转向文化发展研究的主要成果。文集的总题目是《制度创新 推动文化发展繁荣》，这也是我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总看法，即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改革，才能推动中国文化真正发展繁荣。这些文稿被分为八编，每编有一个主题。这八编的主题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集中在第一编，是与文化发展相关的基础理论。这部分文章可以表明我的文化发展理论研究的哲学基础及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来源；它们多数成文较早，与我以前进行的美学或符号哲学研究关系紧密，经过合理的过渡后，这些理论被用于文化发展问题分析。第二层次为第二至第四编，是文化发展理论的核心部分，分别讨论国内的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问题；我认为在 21 世纪的中国要讨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首先就要讨论文化管理体制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问题。这里说的制度是文化市场和公共文化服务。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目前中国文化的严重“失语”状态就是制度创新严重滞后的结果，它使国家形象受损。因此必须运用连续而密集的文化政策工具，系统而有序地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来加以改变。第五至第八编是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可以说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所面对的几个严峻挑战，它们是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保护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创意城市及城市景观打造。我在第二至第四编中的理论观点运用到这部分，并结合具体问题作了进一步推论和思考。

通过对这批文章的整理，我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文化发展研究正走在通往文化经济学的路上。对此我有以下体认。

一、美学理想在现实中的经济学解决方案

曾有朋友建议，将这些文章作些勾连，改写成一本关于文化发展问题的理

论专著。我知道他们是好意，但试过一下很快就放弃了。其主要原因在于这 10 多年里，我的研究方法逐渐发生了位移。尽管很多具体观点一以贯之，但毕竟分析工具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研究更为理论化，稍晚的研究有明显的实际研究及政策咨询性质。晚些时候的研究会照顾更多现实因素，而不仅是单纯的理论逻辑。因此，这些文章的文体、语气等也有显著不同。要将这些文章整理成一本逻辑严密的纯学术专著，显然还要做大量工作^①。但朋友们这些建议，也陷我于更多思考。

改革开放 30 多年，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人员对其传统的研究方式不断进行反省，他们也希望实现自身工作方式的现代化转型。若干年前，文学领域（尤其是文艺理论研究部门）的同事们纷纷转向“新学科”，引进民俗学、人类学、神话学、符号学、语言哲学或解释学还有种种“后现代”文论，完成了一次理论参照系的转换，做出了一批新的成果。当时我暗自庆幸自己的美学研究早早进入哲学领域，有对认识论、方法论的较深思考，因此免于仓促地“改换门庭”。但事实证明，这样的转型仍然是不够的，还需进行第二次转型，要让理论参照系更宽阔。2013 年春节后我与学界一位朋友闲聊，在传统人文研究要与现代社会科学相结合以推动社会进步的问题上颇有同感。通过文集整理，我把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路径探索概括为：让美学“掉头”进入经济学；又让经济学不断“回顾”它在伦理学中的源头。这里美学、伦理学属传统的人文学科；经济学是现代社会科学学的代表。

关于上述前半句的意思，我手边有一个方便的例子可作说明。不久前，我偶然接触到一项农业景观课题成果。当有关方面告诉我这是一个“农业美学”课题时，我并未在意，但当翻开文稿，看到“农业景观”概念时，马上意识到这应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该课题从农业景观审美与艺术审美的区别讲起，不是将农业景观当做低于艺术景观的通俗或“泛文化”审美对象，而是将农村和农村的景色当作一个园林景观，与一般视觉艺术、听觉艺术作品的审美

^① 我这些文章在文体上有明显区别：有的是较专门的理论文章；有的是课堂讲稿；有的是调研报告。这些文章中有一些内容常可“互见”，具有“版块操作”和“版本不断升级”的特征，带有满足各类“甲方特殊要求”的痕迹。甲方又有不同类型：政府、企业、学生及参加培训的公务员等。因此，在文章格式统一问题上会给编辑工作带来较大挑战。重读这些文章，我对文中过多欧化句式也颇感厌恶。

进行对比，强调人就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中，他要不断改造自己的景观，并获得全身心的审美感受。这里还有对人际关系、民俗节庆礼仪的遵循、参与和协调，等等。这显然是农业景观体验与视听艺术作品审美相比时的优越性所在。课题还通过浙江温州楠溪江田园聚落、云南元阳哈尼梯田景观等案例具体展现了这一人文理想。这时审美就是生活，就是有文化创造的生活。从理论上说，这实际上仍是将现代社会人类短暂的审美活动向其在理想状态中的普遍模式进行的一次推演；景观成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审美活动成了人面对特定符号物（如包括了农民、农村的历史在内的整体和理想的农业环境）、对生活的正价值予以认定和反复回味的过程，是对幸福的见证。美学在这里再一次开显出人类学（人本主义）的内涵，要求偶然和短暂的艺术鉴赏实现为永恒的现实存在，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但是从课题中也看到中国农村及农业景观极为不尽如人意甚至已经变得丑陋的现实，就此呼吁城市化和工业化不要进一步去“损害”农业文明，甚至呼吁工业社会及城市“回归”农业文明。这就显现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普遍患有的“乌托邦病症”。

“乌托邦”本不是贬义词，而是历史上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进行过的理论憧憬和现实的悲壮尝试。但“乌托邦”的缺陷是“空想”：不是理想本身错误，而是历史条件缺失。中国当前的“三农问题”即使是在所有既定政策落实的条件下也面临不小的挑战。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都是不可逆的。甚至城市景观尚袒露着追赶者的不从容（劣质、丑陋的大面积住宅小区和一批“豆腐渣工程”），更遑论“反哺”正被剥夺、被损害着的农业及农村景观。

那么，中国的农村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呢？我认为，农村景观或景观农村的构建只能寄希望于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寄希望于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贯彻。更具体地说，只能是从经济学上为农业文明指出一条大幅降低生产成本而极大提高其产品收益水平的可行路径；让一些有条件的农村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从“前现代”跨过现代化阶段，直接进入“后现代”，而抓住旅游时尚兴起的机遇，转型发展“景观农业”就是一种值得尝试的选择。景观农业是旅游产业的组成部分，旅游产业也是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正是使难以为继的现代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现实策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清，为什么美学应该“掉头”，不再仅仅瞭望虚无缥缈的未来，而是埋头脚下，回到现

实，用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手段来改造社会，在推动特定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实现审美理想。我这些年关于文化产业及所有文化政策的讨论大概都是按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通往美学理想的道路不是唯一的，仅仅具有不是很大的可能性，因此文集中这些文章也不是满足于高调宣示某种必然性，而只是就可行性政策在利益相关人（stockholders）之间进行商谈。

让美学走向经济学进入现实，这会不会仍是一个不具历史条件的“乌托邦”呢？我觉得这与我们对于社会发展大趋势的判断有直接关系，我们要能看到并把握住历史中闪现的机遇，尽管它们的“窗口期”都不会很长。

我们在20世纪最后一年介入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研究，那时国内的改革正在重新发力，也正值中国加入WTO谈判的最后阶段。那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还在人们的热议中。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了国际文化产业的崛起，看到这给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那时国内科技界不少有识之士强调踩上高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发展潮头的必要性，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知识经济潮流中文化的重要性。其实，媒体技术只是手段，文化才是内容。其实，全球化进程中比拼的最终是文化，不了解这一点，就会最终失去机遇，输掉竞争。中国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永远不会被“开除球籍”，但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单位，作为一种文明的载体，被“开除球籍”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上的玛雅文明、印加文明都已经消失，“苏联”更是成了历史记忆。中国曾不断失去历史机遇，今天则必须三步并作两步走，在未全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就提前进入“后工业”才行。所谓“后工业”就是“文化工业”“文化产业”。这是一个文化和经济发生紧密联系的时期，也给所有有所准备的国家带来一个重要的机遇期^①。我将这个战略机遇看作美学理想有可能通过经济发展部分实现的历史条件。我的这批文章也多是为中国文化的市场化道路展开的规划与设计。愿它不只是“浮士德式的幻觉”。

^① 世纪之交的那两年，现大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的几位同事专门成立课题组，对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问题进行研讨，不仅向有关部门报告研究结果与政策建议，也以课题组的名义在媒体上发表了一批相关文章，如“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0年第2期）及本书第一编附录中的“知识经济：知识人文化的趋势”等。

二、作为经济学范畴的发展及文化发展

到十七届六中全会形成《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止，新世纪以来国内的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结点，“文化强国”作为一个远大目标已被确立。那么，这十几年的“文化热”与前几次“文化热”有什么区别呢？在“科学发展的文化向度和文化研究的新路径”一文中，我简单回顾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文化研究历程，尤其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研究进行了一些反思。我指出，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发挥了启蒙的巨大作用，“但这些研究具有抽象和理想主义的特征，而且和社会改革的进程相对脱节，最终为社会动荡所终结”；20 世纪 90 年代“国学热”“这种没有竞争、一厢情愿的学术研究很难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而新世纪以来的“文化发展研究还相对稚幼……但它紧紧地踩在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鼓点上，为国家及地方的文化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化产业的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国际文化政策合作提供了及时和有效的咨询服务”。同时“各种社会需求（政府的、企业的）正催促着文化发展研究深化自己的理论”^①。这里的关键是说，文化研究要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效互动，相互激励。这时，发展把文化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并且文化的发展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性因素。

发展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发展概念的前身叫增长，而增长的含义比较狭窄，只盯着 GDP 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这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概念。后来经济学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历程，经济增长涉及更多人文因素。经济学家发现“发展”是一个比“增长”更适用的概念，因此还产生了专门的发展经济学。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国际上发展理论有了更宽阔的视野。一是更多揭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背景，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交往史及相互责任；二是更多强调环境和资源困境下的绿色、可持续观念。经济学中出现了佩鲁的

① 参见本书“科学发展的文化向度和文化研究的新路径”一文。

《新的发展观》及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① 这样的著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继“发展是硬道理”之后，我们的政府也有了科学发展的观念，并且它被明确界定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据上述梳理，我对科学发展观予以高度评价。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或城市科学发展“走在前列”。在对其经验加以总结时我看到：“贯彻科学发展观是发展方式的调整，是引导发展的战略姿态的调整，是领导艺术经过自觉策划后的精彩提升。当产业调整达到了实现人的实时创造时，以人为本的维度被敞开了；当城市的管理日益精细，地方性文化认同同时被表达出来时，全面、协调的整合度达到了最优；而坚定、灵活地运用‘特区’这一体制改革通用工具，使体制创新连续不断，社会发展才成为可持续的。”^② 换一种表述也可以说：“贯彻科学发展观最终是要以调动与发挥中国人的创造性为目标，这才是以人为本；要以建设和谐公正的公民社会为目标，这才需要有全面协调；而要以改革开放为基本推进模式，这样的发展才是渐进和可持续的。”^③ 这样的讨论既是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理论的探索和提升。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毕竟不那么紧密，这些总结和提升也许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要大大提升；反之文化的发展要更多地通过市场环境去实现；文化产业自身的迅速发展将对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质量的提升发挥巨大作用。发达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相继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它们在世纪之交纷纷推出创意经济政策、打造创意城市乃至“创意欧洲”的态势，值得我们密切关注。我们必须更深入地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甚至我们就是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文化及其发展的问题。我希望说明，本书所说的“文化发展研究”与国际上（首先是英国的）“文化研究”有所不同。“文化研究”有更多政治学、社会学色彩，对文化市场颇多微词；我们则更强调从经济学的角度处理文化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是继续深化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要让文化更多地进入市场。

从经济学的角度处理文化发展问题有两个要点应该提及：

其一，我们关注文化发展的制度条件。文化发展繁荣不能仅靠对文化人、

①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贻、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参见本书“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城市与文化发展战略：东部与西部”一文。

③ 参见本书“科学发展的文化向度和文化研究的新路径”一文。

艺术家发出努力工作的号召去实现。根据我们改革开放得出的经验，文化发展也要靠制度创新。七八十年代的安徽小岗村，政策对了、制度调整了，几乎同样的气候、同样的土壤条件、同样的农业技术和农村劳动力，粮食产量与副业收入却迅速提升。20世纪90年代城市及工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也迅速取得生产力水平和职工收入的大幅提高。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不少专家认为我国的粮食、汽车制造等行业会面临灭顶之灾，结果是这些产业都发展得更为迅速。用经济学的话说，这就是市场的威力，是激励匹配的作用。说起来，中国企业的工资水平并不高，但仅仅是有限的提高，就极大提高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恐怕并不例外；专家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喊声不值得当真。复制技术和文化产业的出现，极大降低了文化产品进入市场的门槛，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而目前国内文化产业高增长态势迟迟未出现，都是制度创新严重滞后的结果。

其二，我们不像国外文化研究学派那样过分强调对“文化”概念的界定，而是强调文化进入经济学领域的基本条件。我很赞成特劳伯的说法：“无法避免的窘境是，只有让艺术屈尊沦为产品和服务的范畴，经济学才可能处理它们。”^①所谓文化品（cultural goods），主要就是作为商品的文化二次制成品、技术性的复制品。关注文化品，就是关注文化内容经过复制环节进入市场的情况。至于一般的文化，从前在市场外发展的条件依然存在，还可以另行关注。文化产业的研究都会追述文化市场化的历史进程，述及恩宠制（patronage）的时代向早期艺术市场的发展状况。我们则更简单一些，就强调当代知识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兴起是复制技术不断创新的结果。技术从来是由市场推动的；市场对技术的利用也充满热情。广电尤其是数码技术的昌盛大大降低了文化原创进入市场环境的门槛，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当然飞去的绝大多数是复制品。这个过程中，商业传媒获取了绝大部分利益，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也将越来越多的艺术品（起码是它们的信息）带入了文化市场，促进了文化内容的传播。而传统的艺术品原作市场是微不足道的，那根本还不是个产业。今天文化经济学要研究的就是文化及其复制产品在市场环境中大规

① 该引文的译文“传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当中的艺术问题”已作为“附录3”收入本书第一编中。

模生产、流通的过程及其某些规律。这样我们才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传统经济学几乎不关注各类艺术，而且只有极为稀少的思考涉及艺术与经济的关联”^①。

当然，“最近几年传统经济学已经日渐频繁地聚焦艺术产业。这部分地是因为艺术的兴盛；部分地或许是由于一些经济学家思想的微妙变化，他们看到艺术对于富裕国家的福利有所贡献；部分地也如马克·布劳格所说，是因为‘经济学家渴望将其分析工具应用于迄今未触及的领域，以及艺术管理学家认识到各类艺术面对不断增加着的经济压力’（1976）”^②。在我看来，发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文化发展也是个经济学问题。在国际文化贸易的背景下，用经济学的眼光去分析并解决相关的问题，使我们更容易以平常心看待文化交往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有利于我们摒弃“冷战思维”，推动文明间的和平对话。

三、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野

文化经济学迄今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有很多文化经济学尤其是更专门的艺术经济学著作都会提到其两位创始人鲍莫尔（W. Baumol）和鲍恩（W. Bowen）及其1966年在《文化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那么这个学科的年龄不过50上下。我国国内的文化经济学研究开始于2000年前后，这时“文化产业”才作为一个正面的概念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中。但是我们看到的国外相关资料还很有限，而且对于其中不同的思想传统、不同的方法及理路还难以细致分辨，因此还缺乏思路清晰的深入研究成果。如果说本书里一些文章是文化经济学的研究，那么其专业性还相当有限。我毕竟只是一边补课（阅读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专著），一边以学到的知识去说明实践中碰到的问题。但我直觉地感到，它们更多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因为这些观点都还比较宏观。

当然政治经济学本身并不只是初步的、原则性的甚至粗陋的意思。除了承

① 参见第一编“附录3”中的译文。

② 参见第一编“附录3”中的译文。

认还没能运用什么数学方法之外，我这里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它是规范性的，强调对“应该（如何）”的说明、对原理的说明，而不仅是实证，或对现实的简单描述。第二，它的政策视野是（民族）国家的（例如很像《国富论》的视野），而暂时顾不上对市场内部博弈技巧的揭示，不是专门为文化企业或创意人才个人就业出谋划策的，因为那是微观经济学的问题。应该说，国内文化市场开放度极为有限，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想参与文化生产及销售还受到过多的限制。我们必须优先考虑宏观体制问题。当然，我们也会强调在国际上的比较，中国的文化体制也必须进行现代化转型。第三，它较多聚焦制度研究，强调国家文化发展对制度创新及立法有依赖。制度是伦理在现代国家中的存在形式。制度搞清楚了，国家进行文化生产管理的方式也就更明确，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说的“尚未根本解决”的“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就会有解决的方向、基本理念和顶层设计。我觉得这样的文化政治经济学会更适合中国国情，而且这也体现了前面说过的，让经济学不断“回顾”它在伦理学中的源头。不少经济学家承认，西方经济学关于效率的研究比较充分，但说到公正公平，它们总是语焉不详^①。改革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学家也曾说过“主要强调效率，适度关注公平”的话，其实对于转型过程来说，制度创新的基本尺度就应该是社会公正或者公平。今天中国社会贫富差别这么大，与发展观忽视公平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从我已经进行过的研究来看，这种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应该是怎样的呢？我想可以对它作简单勾勒：

第一，文化政治经济学总的视野应该是文化发展，揭示文化品在文化市场中流通的状况和规律。同时，这种流通总是发生在需求与供给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这两端相互迎合。因此，这种经济学会关注文化品制造、传播的效率和影响问题。现实地看，文化发展总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实现的。例如，我们关注的经济体制。这里说的经济体制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市场，二是公共文化服务。前者是基础性的，后者是辅助性的。

这样，我们要深入说明文化可能通过市场环境得到发展的根本原因。西方学者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研究中，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不少人文知识分子

^① 参见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王志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总是对市场抱批评和怀疑的态度。国内不少专家学者也对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持否定或怀疑、保留态度。因此我们需要对市场进行制度属性分析。如果我们承认市场经济是高效的，那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说明这种效率是如何产生的。其实，市场的效率来自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就是对买卖双方平等地位的相互肯定。在这方面，文化产品的交换并不例外。当然，市场也有其固有的缺陷，较为充分或理想的市场状况并不总是存在。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在亚当·斯密的时代，一方面是古典经济学家终于发现了市场可以自动引导商人利己主义动机的“惊天秘密”，说明所有人的利己行为也可能造成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目睹了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在欧洲社会引发了一次次革命。只是经过对这种明显的矛盾状态进行严肃而现实的调整，市场经济才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进入了比较自觉的制度建设时期。最终是政府和法律这只“看得见的手”出来监管市场，弥补各种“市场失灵”，经济才比较健康地发展起来。2009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再一次表明，过度投机就是最基本的“市场失灵”，因此对市场还须予以更严厉的制度监管。好在市场制度本身并非罪恶，关键是人们如何才能驾驭它、建设它，让它合理运行。在我看来，市场本身不仅有基本的合理性，而且还有成长性。文化的进入不仅会使自身得以发展，而且会对市场制度创新有所贡献。国内有专家说，文化可以进入市场，但不能全部进入市场。这个观点我大致赞成。文化本来并不在市场里（存在大量场外交易），因为市场没有为接纳文化产品做好准备。今天，市场为大量文化产品的进入准备了条件，但的确也不是全部文化产品一下子都可以进去，尤其是较为严肃的文化产品进入市场会有相当一个期间的“时滞”。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必须为更多文化产品进入市场创造条件，而不是过分的怀疑和担忧。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公共服务的出场获得了合法性。我国这两年大力提倡公共文化服务，并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财政资金。但当下的公共服务又严重缺乏效率。本届政府倡导行政体制改革，立志打造服务型政府，这让人对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提高充满期待。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要让公共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必须对其基本原理有充分理解。公共服务不等于计划经济。公共服务与市场有着不断变更又相互补充的明确界线。公共服务严格地说只能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私人品。公共文化服务也是一样，不当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

不仅可能没有效率，还有可能冲击市场，造成“挤出效应”。人们常说政府既不要缺位，也不要越位、错位，而要满足公众的要求，最终只能是在预算形成与执行程序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世界上有的经济学家承认，由于国际贸易和竞争的存在，民族国家的政府也承担着某些经济职能。这些政府职能首先是通过政策工具的运用发挥出来的。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应该在什么环节上用力；怎样一方面助推本国幼稚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不在国际上重新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上去？文化经济学应对它加以研究并提出应对策略。

这两年国家提出了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也作出了让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决定。但这些规划的实施怎样可以为国民所了解；我们不时听到的关于文化产业增加值及增长幅度的数据、“倍增”的响亮表态怎样可以得到合理解读？文化经济学的分析或许有工作要做。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这个首要部分，会有一批最重要的概念及分析路径得到清晰界定。

第二，文化在市场中流通要经过一系列环节，形成创意—生产—销售—传播—消费这样一个完整的、两端可能相互衔接的产业链或价值链。文化经济学要循着这条产业链的顺序，对这一过程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说明；还要以之与传统制造业的产业链相比较，发现二者间的不同，揭示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这一部分应该能够形成几条规律性的法则。例如对文化产业内部出现大、小微两种规模的企业的原因进行说明。传统制造业当中企业规模有差异，这只是受制于投资的多少，而文化产业接近创意的前端往往会产生数量极多的小微企业，而接近市场销售的后端则会有一批大型传媒企业；两者间还会形成微妙的合作联系。因此，文化企业在发展中，不仅会出现“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兼并趋势，还会产生“纵向非一体化”的裂变趋势。进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相关产业政策需要做哪些调整，以利于提高国家文化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文化经济学应该给予细致的关注并给出恰当的政策建议。

随着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文化消费也有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而“媒体过剩、内容稀缺”成了更让人担忧的问题。但经济学家也看到，文化消费不是单纯的文化产品被“用掉”的过程，在很多消费者那里，消费也是投资，他们把自己培养成文化创意的生产者。在网络上，他们的消费感受甚至也可以被他人所分享，成为新的消费品。与此同时，报考艺术院校的年轻人越来越